

论毛泽东建党思想哲学基础的湖湘文化特色

陈兰英,米 华,韩 平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创建而成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包括唯物论基础、认识论基础、辩证法基础、唯物史观基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基础都具有明显的湖湘文化特色。

关键词:湖湘文化;毛泽东建党思想;哲学思想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Culture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Ideology of Mao Tsetung's Party Construction Theory

CHEN Lan-ying, MI Hua, HAN Ping

(Law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Mao Tsetung's Party construction theory is crea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ertain philosophical ideology.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ao Tsetung's Party construction theory includes the basic ideas of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structing CPC possess obvious Hunan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unan culture; Mao Tsetung's Party theory; philosophical ideology

毛泽东建党思想回答了在革命时期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怎样建设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学术界一直都非常注重此项研究,且成果颇丰,但大多着重于对其进行体系化研究,较少就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展开研究,至于对其哲学基础的湖湘文化特色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事实上,由于生长于湖湘大地,大量阅览湖湘典籍加之有浓厚湖湘文化底蕴的老师的言传身教,使得湖湘文化成为毛泽东身上一种显著的文化性格。早年铸就的湖湘文化性格,对毛泽东日后的成长及其思想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尤其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创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首先体现在哲学基础上。通过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的

湖湘文化特色,有助于我们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

一 唯物论、认识论基础的湖湘文化特色

实事求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为毛泽东建党思想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既贯穿于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发展的始终,又渗透和体现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各个方面,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条基本原理,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

收稿日期:2009-08-2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07JD36);湖南科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湖湘文化特色”

作者简介:陈兰英(1985-),女,湖南宁乡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研究;
米 华(1966-),男,湖南溆浦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研究。

分。它的形成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党组织身处农村使得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成分激增,极大地影响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能否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态度是:恪守马列的个别原则个别结论,主张全面实行“吸收工人入党”和“指导机关工人化”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显然是违背中国具体实际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解决办法,主张通过加强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教育,从思想上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建党的问题。

“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中的独特词汇,是军队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党的领导权的实现。这一原则的提出建立在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时期军队和军事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其对现实考察和深刻考量的结果。他认为:党的组织只有深深扎根于士兵之中,才能真正掌握军队,团结群众,战胜敌人。这一原则是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实事求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一方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另一方面又是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合理呈现,带有浓厚的湖湘文化特色。

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倡导务实求真、经世致用的学风。这种学风自宋代湖湘学派创建以来,经过湖湘士人的薪火相传,已经深深扎根湖湘大地,不仅成为湘人的哲学观念,而且成为他们的生活准则。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俩深受二程理学的影响,力主“致知为穷理之门”、“体用合一”、“以仁致用”,为湖湘文化务实、经世的学风奠定了基调。胡宏的高足张栻亦重视通过一事一物即物穷理的积累功夫来求得真知,并主张“以经世为要务”。到了明清之际,王夫之更是提出“即事穷理”、“即物穷理”,“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其实”的朴素唯物主义“实学”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文化中求真务实学风的延续和发展。王夫之后的湖南名流均大倡务实、经世之风。魏源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1]242}并提出:“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1]208}曾国藩对王船山的“格物致知”思想颇为

认同:“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2]“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3]39}谭嗣同亦推崇务实之风,他提出了“学必征诸实事”的务实观。^{[4]426}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标举求实精神:“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5]124}

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早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里烙下了务实求真的印记。他在一师求学时,就特别重视“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6]587}他还提出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6]363}并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便是其早年调查研究的力作。往后,他在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中,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求真务实的重要性,并把湘人的求真务实观成功地融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浓缩成四个字“实事求是”。

二 辩证法基础的湖湘文化特色

毛泽东是一个辩证法大师。以对立统一的矛盾观为核心的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善于将理论运用到党的实际工作中。

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性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体现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是矛盾原理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他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理论也充分体现了矛盾辩证法的原理。毛泽东利用矛盾转换原理,正确阐释了党内斗争与团结的关系。他认为党内斗争与团结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内斗争是达成党的团结的途径和手段,党的团结则须通过积极的党内斗争才能实现。他提出要以“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开展党内斗争的基本方针。

此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关于党的策略的原理等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矛盾辩证法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哲学基础,它

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但同时也是湖湘文化的组成因素。湖湘文化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吸取湖湘传统的矛盾观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创建出自己的矛盾哲学,大大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理论。

湖湘学派的创建者或代表人物都有着一定的矛盾思想。胡宏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盖天地之间,物必有对,感则必应,出则必反,不易之理也。”^{[8]325}明清之交的王夫之,是中国哲学史上集中国古代哲学之大成者。他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9]36}“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10]1089}“万殊之生,因乎一气,二气之合,行乎万殊”。^{[9]38}并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9]42}近代魏源不仅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而且认为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相反适以相成也”。^{[11]26}他还指出矛盾的双方会互相转化,“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11]18}曾国藩吸收了船山的“一物两体”、“两不立则不可见”的矛盾论:“非两不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3]78}谭嗣同也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阴阳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4]246}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认为:“有原动力,则必有反动力,原动力大,则反动力亦大。”^{[5]24}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认为“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6]184}没有差别和矛盾,就没有事物。他还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中,认识到“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都是差别的表现,都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没有这些差别和矛盾,便“不能构成历史生活”。^{[6]245}

三 唯物史观基础的湖湘文化特色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理论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并进一步论证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

的地位,而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宗旨理论、党的群众观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工作作风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1031}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11]790}“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11]933}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12]“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3]“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1096}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1]899}这些理论都是唯物史观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础一方面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同时也与湖湘文化的民本传统有着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

湖湘学派的早期代表们继承了儒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通过代代湖湘人的发扬,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胡宏的民本思想非常突出,认为“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8]197}提出“治道以卹民为本”,^{[8]118}主张轻徭薄赋、宽民力、养民。胡宏弟子张栻亦充分肯定人民的地位,他说“固国以得民为本”。^{[14]270}他主张为民、爱民、养民,认为“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4]261}“王者之政,大要使民有恒心而已”。^{[14]253}王夫之亦主张重民,曾提出“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等重民思想。^{[10]896}近代湖湘文化代表魏源继承并发展了湖湘民本传统。他将民众比作人的鼻息,“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与?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口可以终日闭而鼻不可一息?古圣帝明王,惟恐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1]67}而曾国藩,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都始终“以爱民为第一义”,^{[3]540}将爱民“视为性命根本之事”。^[15]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继承并发扬了湖湘“民贵君轻”的思想:“国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4]56}湖湘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已觉察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记有:“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人;其得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6]588}后来又在《民众大联合》中提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6]338}

湖湘民本传统是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源泉之一。毛泽东的群众观继承了湖湘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如肯定民众的地位——“民为邦本”,重视民众的力量,强调“爱民、养民、富民”。但它又借助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剔除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阶级局限性,是对它的合理改造和升华。传统民本思想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帝王的统治地位,而毛泽东的群众观则是在充分肯定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求利益,为群众服务。

参考文献:

[1] 魏源. 魏源集:上册 [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6.

- [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14诗文集 [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6.
- [3] 曾国藩全集·家书 [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5.
- [4]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 [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4.
- [5] 杨昌济. 杨昌济文集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 [6] 毛泽东早期文稿 [M]. 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0.
-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318.
- [8] 胡宏. 胡宏集 [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7.
- [9] 王船山. 船山全书:第12册 [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8.
- [10] 王船山. 船山全书:第1册 [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8.
-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544.
-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581.
- [14] 张栻. 张栻全集 [M]. 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
- [15]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 [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92: 2661.

责任编辑:骆晓会

(上接第33页)

- [8] 李大钊.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M]//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76 - 78.
- [9] 刘立凯辑. 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记 [M]//五四爱国运动(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498.
- [10] 海上闲人. 上海罢市实录 [M]//五四爱国运动(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10 - 21.
- [11]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M]//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2 - 33.
- [12] 李大钊. 青春 [M]//五四运动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37 - 38.
- [13] 罗家伦. 答张继 [M]//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90.
- [14] 逸名. 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 [M]//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17.
- [15] 蔡元培. 《国民》杂志序 [M]//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24 - 25.
- [16] 张化冰. 浅论《新青年》作者群的形成 [J]. 新闻与传播

研究, 2005(4): 31 - 34.

- [17] 陈万雄.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M].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17.
- [18] 杨晦.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M]//五四运动回忆录(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219.
- [19] 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M]//蔡元培全集(7).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199.
- [20] 金林祥. 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121.
- [21] 李大钊.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M]//李大钊全集(3).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223.
- [22] 陈独秀. 敬告青年 [M]//五四运动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1 - 2.
- [23] 罗章龙. 椿园载记 [M]//任建树. 陈独秀大传.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67.

责任编辑:骆晓会